

再访瑞典

芦笛

前两天去瑞典走了一遭，这是我阔别将近 20 年后再度访问该国。我历来对这个国家印象极好。这次去觉得山河依旧，只是不知怎的，民风没有以前淳朴了。

我爱瑞典，首先是它的迷人的自然风光。斯德哥尔摩素称欧洲最美的首都之一。在我看来，它一年大约有半年当得上这个称呼，也就是夏秋两季吧。过了这六个月，剩下的六个月就跟英国一样，完全是一个没有阳光的国家，天空恒定是灰色的，永无晴朗之时。瑞典南部因受所谓海湾洋流 **Gulf Current** 的影响，如同英国受大西洋暖流影响一般，冬天湿润温和，气温比同纬度的大陆地区高多了。当然只是相对而言，比起英国来，它要冷得多。而且，冬天的白昼太短。即使是位于瑞典南部的斯德哥尔摩或是哥德堡，冬季也只有六小时是白天，其余都是黑夜。您只要冬天到斯德哥尔摩北面的达拉纳去呆上几天，立即就会明白为何瑞典的忧郁症患者会那么多。那儿冬天的白天只有正午那两三小时天亮（其实也就相当于清晨与黄昏接在一起，可不是青天白日，荡荡乾坤）。再往北去，就进入北极圈了，一年有半年不见天日，冬天 24 小时笼罩在黑夜里，真是说不出的 **miser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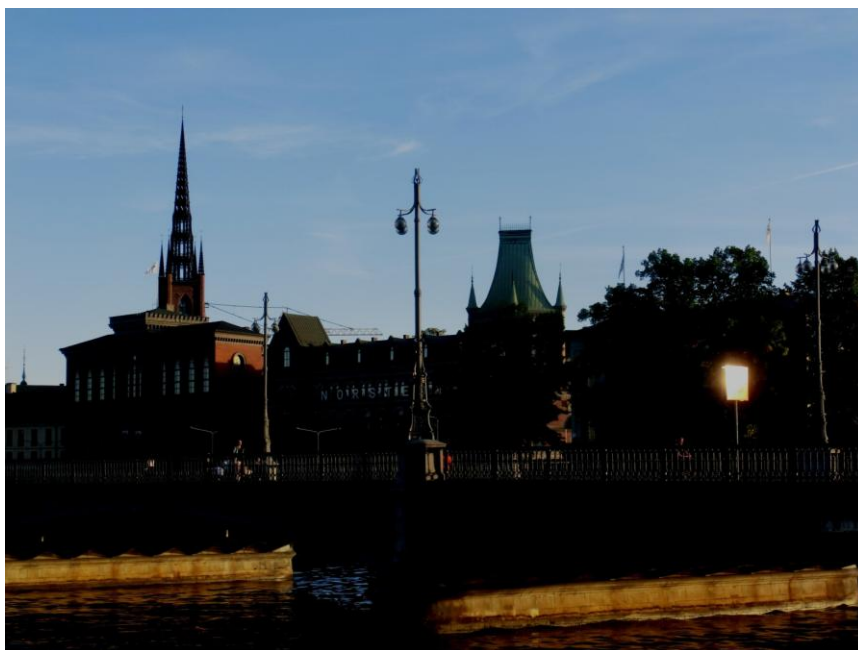
然而瑞典的夏天却是美丽的，瑞典人也知道，所以夏季全民都在休假，全民都在大街上，酒馆饭馆一直喧腾到半夜（当然也不能说是半夜，因为瑞典夏天的半夜看上去跟别处的黄昏也差不多），公园里到处是人，而且都非常友好善良，跟你素不相识，却会盛情邀请你参加他们跳舞。空气中处处洋溢着一种说不出的感人的欢欣，于是冬天患上的忧郁症至此不药而愈。

这当然是将近 20 年前的回忆了，我这次去是在夏秋之交，天气已经开始凉下来了，白天也不再那么长，晚上 8 点左右黑定。不过，风光还是照样迷人。

闲话少说，上照片吧。都是老婆子拍的。我嫌自己的相机重，没拿去。水平有限，诸位多多包涵。



斯德哥尔摩市政大厅远眺。



桥下秋波反射着斜晖，将桥底映得通明透亮。

这里要解释一下，斯德哥尔摩是由泡在波罗的海里的好几个岛屿组成的，岛屿之间以桥连接，那情景有点类似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区别只在于，阿姆斯特丹的桥下是运河，而连接斯德哥尔摩市各区的桥的下面是波罗的海。波罗的海与瑞典陆地犬牙交错，其伸入陆地的水面一般都比较窄，看上去很像河水，其实是海水。20年前，我为了验证这一点，还专门尝过桥下春波，味道微咸（不知道归中医的哪条经），绝不像别处海水那样苦涩。我疑惑不定，请教当地人，人家坚称那是海水。我看了地图后也确认是海水，因问道：为何海水会那么淡？答曰：河流很多，稀释了。这次我又在斯德哥尔摩动物园岛（Djurgården）的海边尝了一次，味觉与记忆中的相符，微咸。因此，斯德哥尔摩旁边的海水是我尝过的最淡的。



议会大厦，在皇宫旁边的小岛上，但因桥梁连接，“海河”又很窄，一般不会注意到这点。



皇宫大门剪影。如今的瑞典国王原产地法国，其祖先是拿破仑手下的元帅贝尔纳多特。这贝尔纳多特是行伍出身，在法国大革命以及继后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从普通 军人升为元帅。瑞典被俄国打败丢了芬兰后，全国一直痛感缺乏有才能的将领，于是就到法国去邀请贝尔纳多特元帅前来，经国会选举为该国王储（老王无后）。贝 尔纳多特于是欣然命驾，前往瑞典当太子，他果然不负众望，虽然终身不会说瑞典话，更不会读写瑞典文，毕竟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他不但把国运押在了 胜利一方，加入了反法的神圣同盟，还给神圣同盟的统帅们出了个取胜高招，教他们避实击虚，不要跟战无不胜的拿破仑作战，而是去修理他手下的将领，致使拿破 仑最后推盘认输（第一次退位），使得瑞典在战后未遭到列强报复。贝尔纳多特还发兵挪威，战胜该国后自任挪威国王，将瑞典与挪威结成一

体。只是该同志生长在 阳光明媚的法国，从未见过那种半年不见天日的极北苦寒之地，因此据说跟老芦一样，冬天从来不下床。如今瑞典王室的老祖宗，就是这么一个血统纯正的法国人。

瑞典皇宫据说是欧洲最大的皇宫之一。不过里面第一不许照相，第二不够奢华，论奢华度我看还不如英国贵族府邸，第三使用的大理石颜色不对，看上去脏兮兮的。瑞典过去毕竟只是个穷国。现代王室又备受国会管束，连立皇储这种家事都不能自专。瑞典原来的皇储是国王的独子菲利普，但后来议会通过王位继承法，规定不得 实行性别歧视，不管是男是女，王位都必须传给老大，于是强迫国王把王储改为他家的老大，亦即现在的女太子（crown princess）维多利亚：

他妈的这是什么暴政？连老芦这铁杆自由主义者都看不下去了。这女太子后来嫁了个普通大兵，该大兵原是她们的教练（trainer，我也不知道是 train 什么）。据说她老爹原来不同意，后来也就算了。



皇宫门前桥上军乐队游行



皇宫门前的狰狞石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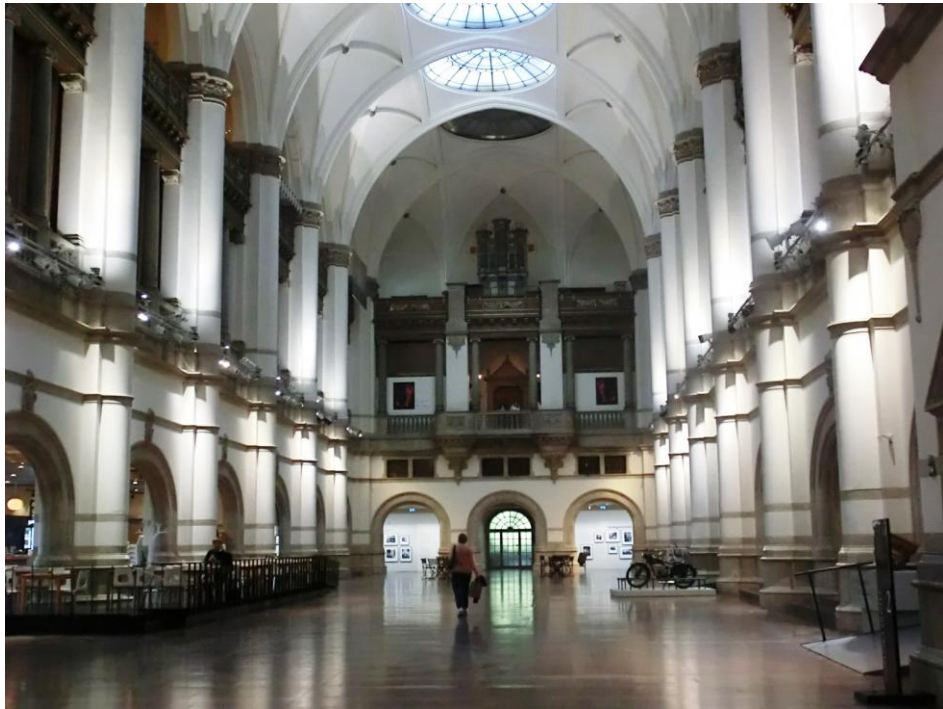






皇家运河游船上所见两岸风光。所谓“皇家运河游船”（Royal Canal Tour）的费用包括在“斯德哥尔摩卡”（Stockholm Card）上，该卡可以在网上预先订购，到斯德哥尔摩后再去 information centre 取。有 1、3、5 日不同时限，有效期间允许免费乘坐所有公车（包括地铁，电车，但不包括渡船 ferry），免费访问斯德哥尔摩 80 多家博物馆，还能免费乘坐一次皇家运河游船。

上面最后一幅是今日仿造之早期中世纪赫赫有名的横行天下的北欧海盗（Viking，通译维京海盗）乘坐的战船。Viking 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传统叫法，包括丹麦，不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老祖宗。丹麦的国歌好像就唱他们是 Viking 的后代，很以杀人越货的海盗祖宗自豪。



北欧博物馆（Nordic Museum）馆内。这个景点不在旅游网站所列 top 10 内，但个人觉得值得一看，当然取决于各人兴趣。



著名的瓦萨（Vasa）号沉船。该船因为上层建筑太高，吃水不够深，压舱物不够重，在下水后处女航遇到乱风（gust）就倾倒沉没了。上世纪 60 年代被捞起来，陈列在专门建造的恒温恒湿的博物馆内。我记得《新概念英语》第三册上还有篇课文专讲此事。该博物馆在动物园岛上，属于不值得去而又不能不去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旅游是为了日后讲起来可以吹“那地方我也去过，没什么了不起的”。瓦萨博物馆就是这种背时地方，被瑞典

官方旅游网站列为 TOP10 之一，据说是访客最多的名胜，因此不能不去。尤为背时的是老芦竟然去了两次，第二次是为了带太太去而做出的惨痛牺牲。



动物园岛（Djurgården）上风光。



尤金亲王的夏日别墅，现为博物馆，也在动物园岛上。亲王本人是画家，博物馆内收藏了一些他本人及其他当代画家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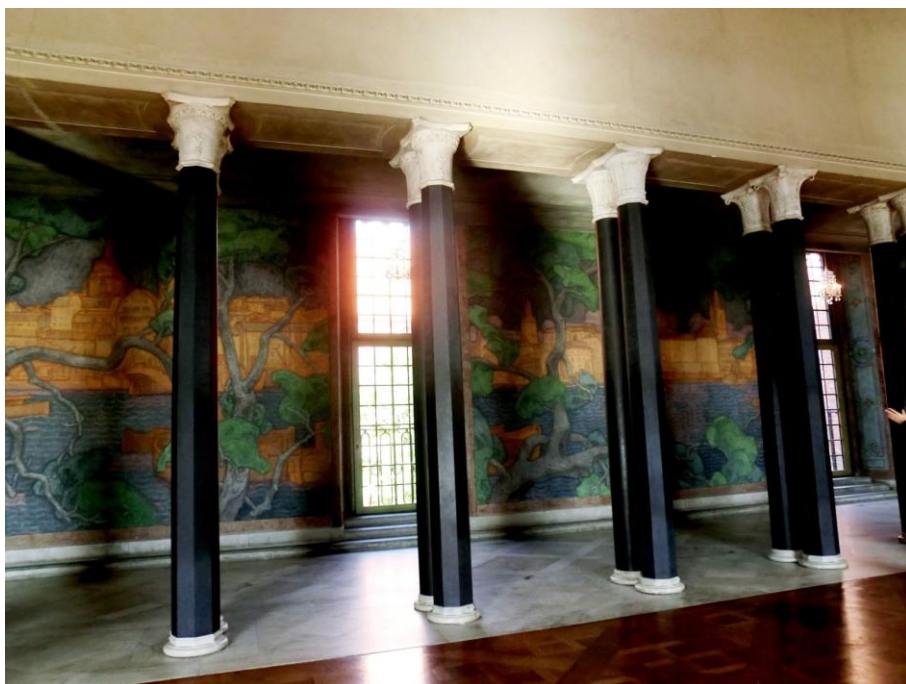
尤金亲王夏日别墅门前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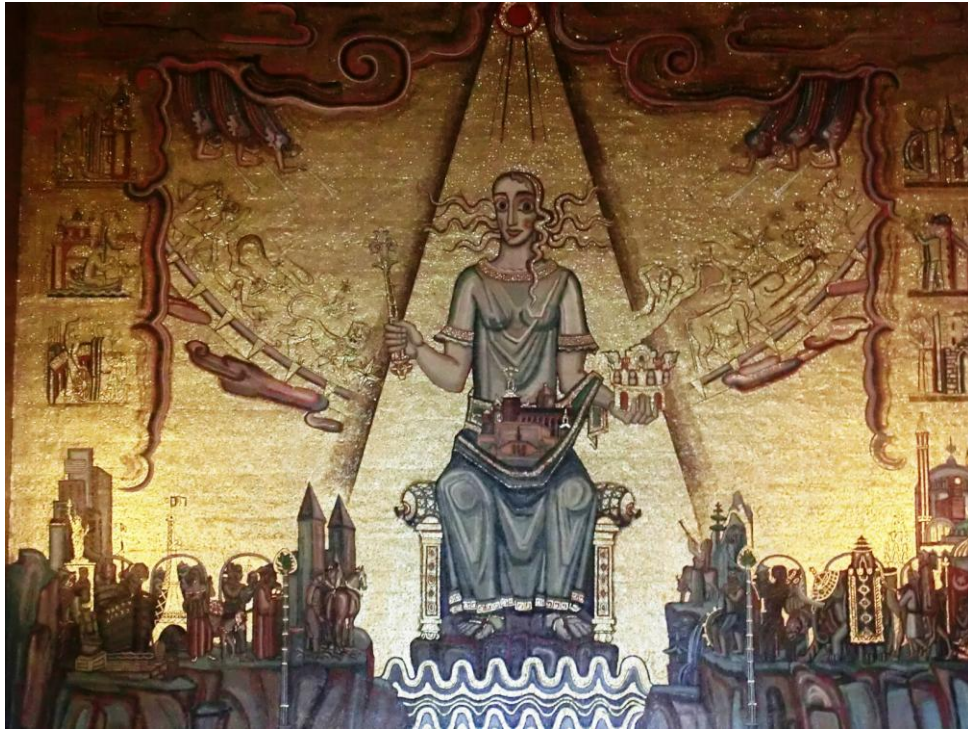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外风光。市政厅是斯德哥尔摩的 TOP10 之一，也属于不可不去类，但该建筑只有 90 年左右的历史，其所以出名，是因为诺贝尔晚宴是在里面举行的，因此游客纷纷前去沾点仙气。



斯德哥尔摩市政大厅内，据说诺贝尔奖晚宴即在此举行，发言人就站在那台阶上，似乎比较寒酸。



市政厅内的某个厅（记不得名字了），柱后的现代壁画是尤金亲王花了三年免费制作的，因为他是皇族，所以不能拿报酬。



市政厅内的主要大厅(名字忘记了)墙上的现代马赛克壁画，那女的是什么人我也忘记了。

下面这几张照片是动物园岛上的 Scansen 内照的，Scansen 也是 TOP10 之一，不可不去，但很值得去，坐 7 路有轨电车（英文是 tram，瑞典话 是 s 开头的一个长字，如果问路说 tram，当地人未必懂，苦恼啊）能坐到门口。它据说是世界上第一家露天博物馆，园内除了有动物园外（规模虽小，也还不错，因为是极北苦寒之地，所以特地弄了一些热带亚热带的动植物给本地人解馋过干瘾），主要由 150 多个历史建筑组成，都是各地拆迁来原样重建的，里面还有 穿着当时服装的人表演劳作或日常生活，有点像国内的民俗村。





Scansen 露天博物馆内的极北苦寒之地的游牧民族的原始住宅。该少数民族类似爱斯基摩人，住在北极圈内，主要以养驯鹿（reindeer）为生，其名称我忘记了，本老年痴呆现在健忘如飞。



传统农家院落，像不像中国的？

请注意，这可不是极北苦寒之地的少数民族哦，是多数民族的村落。瑞典在 20 世纪初以前一直很穷，尚未实现工业化，人民自觉发财无望，大量移民美国，以致据说芝加哥的瑞典人比哥特堡（瑞典第二大城市）的人口还要多。瑞典的起飞是在二战前后才完成的。因为极为明智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它的工业化没有被战争打断，在战后迅即起飞，不旋踵就变成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而且，它与邻国挪威完全不一样，挪威有丰

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而瑞典的腾飞靠的完全是其高 端工业与高科技出口。



传统村镇集市，除了远处的教堂外，与中国完全一样。



佃农之家。瑞典从无农奴制，从中世纪起，农民就是类似中国的自由农。佃农住在地主庄园里，地主为其提供食宿与劳动报酬。



地主老财的豪宅。



传统村学，瑞典从上世纪 20 年代实行全民义务教育，该村学只有一个教室，教师的家就在隔壁的房间里。

我爱瑞典，最爱的还是居住在那片极北苦寒之地上的人。在我看来，瑞典人或许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但 大概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大多数人善良、诚实、友好、热情、礼貌、乐于助人。当然，这些品格似乎是西方文明国家公民的共性，并不为瑞典人独有，但在我眼 中，瑞典人有着一份别处难得见到的谦冲自牧与仁厚包容。

20 年前，我首次在斯德哥尔摩坐游船，船上的讲解员在向我们简介瑞典的历史时说：瑞典虽然是欧洲第四大国（领土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但人口稀少，所以很 惭愧，我们的文

化没有英国、法国、德国那些国家那么辉煌。当然，我们也出过几个科学家，除了诺贝尔大家都知道外，还有生物学家林奈，发明摄氏温度的摄尔修斯，等等。不过，这些人也不能算科学史上的巨人，比不得牛顿、爱因斯坦。

这话透出的诚实与谦卑，令我大吃一惊，我还从未见过有哪个国家的人主动承认自己的文化不如邻国的灿烂。

此后瑞典同事又告诉我，他们的大学教科书不是自己编的，是直接从英美买来的，这就是他们何以如此熟悉科技英语，因为当初学的就是英语教科书。我再度大吃一惊，问道：你们为何不自编教科书？答曰：不划算，瑞典只有几百万人口，大学生的绝对数量太低，自编教科书还不如直接去国外买便宜。经济上的考虑竟然会压倒民族自尊心，这种怪事实在超出了我的所见所闻。

后来我才发现，瑞典人根本没有我们所谓的“民族自尊心”，其心态之健康与开放，别说在中国见不到，在欧洲其他地方也罕见。瑞典的学童从8岁就开始学英语，所有的进口电视电影从不配音翻译，而是打上瑞典文字幕。有线电视中还有BBC World News的频道。

我多次问过瑞典朋友：你们这么做，怕不怕失去自己的national identity？会不会伤害到你们的national pride？据我所知，法国人对这问题就非常敏感，生怕英语污染了自己的语言，你们有没有这种担心？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我们没有类似的问题。再问：为什么没有？答曰：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周围的人从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担忧的事。

这结果就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口音并不重。一个英语国家的人在瑞典，有点像个生活在本国的文盲，语言障碍只存在于文字阅读中。对我来说，口语交流甚至比在英美还容易。这是因为英美人的听力实在太差了，外国人发音稍微差点，他们就听不懂，正如北京人是全中国听力最差的人，经常听不懂外地人说的普通话一般。而同是外国人讲第三国语言，大家都习惯了不标准的发音，自然也就没有这问题。在英美，我初期的困扰是我听不懂人家，后期的苦恼则是人家听不懂我（尤其是在美国）。而在瑞典，除非是跟老头老太打交道，我还从没遇到过类似问题。

或许就是因为这种开明开放包容的心胸，使得瑞典人成了世界上最少排外思想与种族歧视的善良仁厚的民族。多年来，瑞典向第三世界走投无路的难民张开了热情的双臂，慷慨收容他们，是接纳越南船民最多的国家，其数目远远超过美国。如今瑞典的950万人口中，有15%是外来移民，5%的人口是第二代移民。这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原来的瑞典人迟早要步萨米人的后尘，从原住民变成少数民族。

瑞典人还是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民族。我曾跟瑞典朋友说，很难设想你们是凶猛野蛮（savage）的维京海盗的后代，也难以设想你们的祖先曾在17世纪建立了威震一时、囊括了波罗的海的瑞典帝国。看起来，比起老祖宗来，你们是极大地柔化了。他们都笑着说，是的，应该是这样，我们确实是极大地柔化了。从1814年贝尔纳多特率军征服挪威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打过一次仗。

的确，在过往200年中，瑞典既无战争，也无革命，除了瑞士，世界上大约还没有哪个国家安享过如此悠久的和平岁月。然而“柔化”并不等于“柔弱”，瑞典能够久享太平，与其领

导人的政治智慧以及人民捍卫独立的坚强意志分不开。二战与冷战都是对瑞典国家领导人政治智慧的严峻考验，尤以二战为甚。

当时瑞典的北欧邻居都给卷入了战火：挪威和丹麦为德军占领，芬兰成了轴心国的一员，唯有瑞典在东西两大豺狼的夹击中保持着艰难的中立。这事实颇为某些人诟病，也成了许多瑞典知识分子良心责备的内容。他们指责瑞典当局屈服于纳粹压力，让德军使用铁路将军队和装备从挪威运到芬兰去，并与纳粹保持贸易关系，向德国出口了急需的铁矿石，等等。

但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为了避免遭到德军占领而不得不作出的有限让步。只有区区数百万人的瑞典岂是德国巨人的对手？瑞典人并没有在道德上保持中立。相反，在苏芬战争期间，瑞典派出了志愿军团以及空军，与芬兰人民并肩抗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纳粹占领了大部分欧洲后，瑞典在暗地里作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接纳了大量丹麦、挪威等国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瑞典驻匈牙利的外交官拉乌尔·瓦伦贝格还向数千名匈牙利的犹太人发放了瑞典护照，将他们从屠刀下救了出来。他甚至自己花钱在布达佩斯租下了 32 处建筑，宣称其享受外交豁免权，将上万名犹太人藏在其中。可惜如此伟大的人道主义英雄，最后却被苏军抓走，死在卢比扬卡监狱里。此外，瑞典还与盟军分享情报，并秘密训练武装了从丹麦和挪威逃来的难民，准备日后让他们解放自己的祖国。

在冷战中，瑞典同样在东西两大阵营对峙中保持中立，暗地里却与北约达成谅解，获得了美国提供保护的秘密承诺，尽管如此，瑞典人独力保卫自己的意志仍是不容轻侮的。

1981 年 10 月，苏联一艘潜艇在瑞典南部的海底触礁，不得不在瑞典的海军基地附近浮出，侵犯了瑞典的领海。双方正在交涉中，苏军派来了援救该艇的特遣舰队。当该舰队驶近瑞典海岸线时，立即就被海岸大炮的雷达锁定。当舰队接近 12 海里领海边界线时，海岸炮兵奉命将雷达切换入战斗状态。特遣舰队察觉了对方雷达信号的这一转换，吓得立即掉头退回国际水域，只留下了一艘未武装的拖船滞留在 12 海里范围内。瑞军派出鱼雷艇去，要求该船也退出瑞典领海，该船于是只得乖乖退回国际水域。

此后瑞典人把潜艇艇长弄上岸去审讯，登艇检查了航行日志以及该艇的设备，研究人员还用计数器秘密检查了放射性，测出该艇装备了核鱼雷，其当量相当于投掷在长崎的原子弹。这情报引起了瑞典当局的高度戒备。恰好此时风暴来临，触礁的苏联潜艇发出了求救呼号。昏天黑地之中，但见从苏联特遣舰队方向开来两只船，越过了 12 海里边境线。瑞典首相断然向军队统帅下令：“守住边境！”海岸炮兵全都奉命进入战斗位置，挂上了反舰导弹的军机随时准备起飞，大战一触即发。幸亏瑞典的快速攻击艇截住了来船，才发现原来是西德来的货轮。十天后，瑞典的拖船把苏联潜艇从礁石上拖出，拖到了公海上，交给了停泊在那儿等候的苏联舰队，危机才算结束。

这个轰动世界的危机（当年我在国内就关注过），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瑞典人捍卫自己的家园的决心与勇气。我这次去瑞典参观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空军基地。那深藏地底的能防核攻击的军事基地有指挥中心，通讯中心，机库，工厂，等等，在在显示了瑞典人居安思危。那儿陈列的瑞典独力研制生产的第一流军机 Saab 35 Draken 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机是世界上首次使用所谓“双三角”机翼布局（亦即在大三角翼端又长出两个小三角来，见图）全天候多用途超音速战斗机，具有良好的瞬时转向功能，因此不但 是理想的截击机，也能用于空中格斗，在冷战时代名声甚著，并不亚于苏美当时的先进战机。考虑到瑞典的全国人口还不到重庆市的三分之一，能造出这种高科技尖端产品来真是了不起。

光是这一事实，就体现了瑞典那与人口总数毫不对称的综合国力。根据英文维基百科，今天，瑞典人均收入为世界第八名，民主指数为世界第二名，联合国人类发展 指数第七名，2013 年美好生活指数第二名，2012 年全球繁荣指数第三名，2012 年，瑞典的国际竞争力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世界第四名，据联合国统计，瑞典是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10 年，瑞典的基尼系数仅为 0.25，因而成了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2013 年，《经济学家》杂志声 称，北欧诸国“可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而其中以瑞典为第一。2013 年，“名望研究所”声称，瑞典的名望居全球第二。

正因为此，20 年前我初访瑞典，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地球上真有圣经上说的乐园，那么就是它了。起码，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天堂就算真能实现，充其量也不过如此吧。”

而这一切都是经过和平进化实现的，在长达 200 年的悠悠岁月里，没有响过一声枪，流过一滴血，瑞典人把自己的国家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封建国家，改造成了一个 高度繁荣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话来说就是“人民的家园”（Folkhemmet，据我这篇文盲的猜测，folk 与英文一样，是“人民”的意思，在德文中可能是 volk，大众熟知的“大众汽车”其实是“人民汽车”——Volkswagen, folk's wagon，人民的四轮马车，而 hemmet 相当于英文的 home。文盲在异国过日子，猜功是很重要的）。瑞典的发展史，乃至整个北欧的发展史，就是“民主恩赐论”的生动证明，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伯恩斯坦的一系列光辉论述的有力证明。

老帮菜都知道伯恩斯坦那个老牌修正主义者，但所谓“知道”，也就是听说他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 社会主义”，以及其名言：“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我本人是到了西方后，才得知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重大修正的。而且，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他的一系列论断是正确的，反对他的列宁完全错了。如今，列宁的第三国际早已烟消云散，而秉承伯恩斯坦衣钵的“社会党国际”却有着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160 个成员党，其中执政或参与执政的党多达 40 多个，阵容远远超过当年苏联人用刺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ialist_International）

伯恩斯坦原是个德国革命愤青，马克思的虔诚弟子，因受到官府迫害，流亡到了英国。当时德国与英国完全是两个世界，德国在铁血首相俾士麦的统治下，公民缺乏 政治自由，政府实行严格的出版审查，工人阶级地位以及待遇都比较差。相比之下，英国完全是个自由世界，不但知识分子享有高度的言论出版自由，而且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待遇都要强过德国。眼界大开的老伯于是开始仔细审视英国社会，逐渐发现了马克思的一系列斩钉截铁的预言与现实发展的趋势并不一致。在马恩逝世 后，他写出了一系列作品，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大修正。

伯恩斯坦观察到，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恩说的那样即将灭亡，相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资本的集中并非马恩说的那样是普遍现象，从整体看反而变得更加分散。工人阶级并没有如马恩预言的那样日益贫困化，其政治经济地位反倒日益改善。中产阶级也并非如马恩预言的那样日益萎缩，被迫 加入无产阶级大军，反倒是越来越多的人从无产阶级上升为中产阶级，使中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

根据这些事实，他得出结论，马恩认为资本主义行将灭亡、无产阶级必将通过一系列的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预言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需要资本主义的毁灭，相反，它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他指出：

“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压迫、 贫困和屈辱大大增加的结果，而是他们日趋增长的社会影响和他们所争得的经济、政治、一般社会和道德的相对改进的结果。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混乱中产生的，而是由于工人在自由经济领域中的有组织的创造同战斗的民主制在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中的创造和成就相结合而产生的。透过反动势力的一切抽搐和一切挣扎， 我看到阶级斗争本身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

换用大白话来表述，老伯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使得工人阶级越来越穷，最终引发暴力革命，反而因为工人阶级越来越富、地位越来越高的结果。据此，他将马恩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战争”等理论，修正为“民主”与“阶级合作”，亦即通过议会民主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既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重要的是不断的进步，而不是某一个终极目标（这就是为老帮菜们熟知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的正解）。

老伯的另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厘清了“社会主义”的观念。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总结为一句话：废除私有财产。”（此处据英文版译出，钦定中文版为“消灭私有制”）据此，所有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社会主义”与“公有制”连在一起，两者似乎成了同义词。

但伯恩斯坦高瞻远瞩地看到了公有化必然发生的弊病。他认为，如果把全国的企业都收归国有，必然要造成生产过程的官僚主义化。这种生产方式缺乏彻底改良技术的动力以及冒险的勇气，其效率一定比不上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换用大白话来说，老伯实际上英明地预见到了，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的“公有制”，只会在实践中变成弊端无穷的“官有制”。因此，他认为可以采用多种所有制方式，而以法律来调节之——“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几百个企业和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

至此，“社会主义”总算跟“国有化”脱了钩。个人认为，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突破，也符合真实的历史发展。如我在旧作《什么是资本主义》中指出的，如今“社会主义”在西方已经不再是一种社会制度或生产方式，而是化作了一种经济政策，具体来说也就是国家以税收方式来调节二次分配。说白了，所谓现代社会主义，就是由国家主持的劫富济贫的慈善事业，“社会主义国家”与“福利国家”其实是同义语。

最难得的，还是他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老伯指出，马克思是按照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专政的模式来构想“无产阶级专政”的，但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阶级，而是包含多种阶级在内的复合体，并非所有的工人都支持社会主义。在可以通过合法选举参与立法时，还有什么必要去搞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靠暴力维持的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文明的倒退，政治的隔代遗传。它有可能违反人道主义，通过剥夺其他社会阶层的平等权利来制造新的不平等，最终连工人自己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十月革命发生后，伯恩斯坦更是不遗余力地抨击列宁建立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十月革命不过是亚洲国家使用暴力更换政权的典型政变，是靠粗鲁的、未受政治教育的大兵实现的反革命叛乱。一个专制的政党干掉了（二月）革命，靠军事独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自己的国家中建立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秩序，其与旧秩序的区别仅在于它处于更低级的文化阶段。

他最后断然判定：

“因为镇压一切精神生活，消灭独立的传媒，布尔什维克比任何其他参加革命的党都更接近沙皇。不管那场政变的领导人的目标有多真诚，历史都绝不会将这场叛乱称为革命，因为布尔什维克使得一个伟大的国家沦入精神上与道德上的奴役。”

老伯的预言还真说中了，近年出版的俄国历史学家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将所谓“十月革命”定义为“政变”，这一新定义已为大部分俄国教科书采用。

他兑现了的预言又岂止这一条？如我在前节末尾说的，北欧的历史，就是“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历史。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是靠议会道路上台的，上台后奉行阶级合作，尽管长期一党独大，他们仍然注意团结各阶层，在推行重大社会改革时充分征询反对党意见，并将其领袖纳入各种委员会，尽可能减轻社会主义改造遇到的阻力。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老伯的新定义，并不是共产党人的“剥夺剥夺者”，而是通过税收劫富济贫。前文说过，2010年，瑞典的基尼系数仅为0.25，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但收入平均，并不意味着财产也平均，该国同年的财产基尼系数为0.85，比欧洲的平均值0.8略高。在我看来，比起笨拙粗暴血腥的公有化来，这种均贫富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要更小更人道，而且能令穷人真正受益。

不仅如此，从老伯的理论还可以推知，随着民主的普及与发展，资本主义迟早要和平发展为社会主义。这并不限于老伯的故乡德国或是北欧，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就连最顽固的自由资本主义堡垒美国也遭到了这潮流的冲击。老哈已经在他的近作中指出了这一点。他哀叹：“美国社会向社会主义滑行的趋向看来很难阻挡，这才真正体现了民主制度的弊病。真正有眼光的政治精英们很难实现抱负，这个现实令人痛苦。”

作为“真正有眼光的政治精英”，老哈只是指出了这个趋势，除了指责掌控美国媒体的公知们“不管美国社会大踏步或小踏步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归路对美国人的子孙后代是多么可怕的前景，这些人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学术或名利的成就，他们要出人头地只能寻求标新立异的观念”、“讨好穷人懒人”之外，并没有分析他眼中的这个弊病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这是因为民主是“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无论在何种社会里，有钱人总是少数人，而穷人总是社会的大多数。民主意味着让多数人掌握国民收入的分配权，而这就意味着推行使穷人受益的社会主义政策。至于什么远见卓识根本就不是百姓的官能，他们关心的只会是蝇头小利。你既然要在专制与民主之间选择后者，当然也就只能接受它的一切后果，包括“国策由短视自私的大多数决定”这一条。

那么，这一趋势到底是好是坏？欧洲社会主义真是美国同志们认定的“泥坑”么？说实在的，我出国前倒是个死硬的右派，出来后对此问题反而越来越稀里糊涂了。

西方流传的一句名言是：“如果一个人二十岁时不是社会主义者，那他就没有心肝。如果他到四十岁时还不是保守主义者，那他就没有脑袋。”这句话及其变种版本曾被归在许多伟人名下，从丘吉尔直到撒切尔，甚至还有爱因斯坦，但其实都是“拉郎配”，至今我尚未考证出此话是谁说的。

这话的涵义非常浅显：社会主义代表着一种善良的梦想，如果一个人青年时代没有善良的梦幻，当然就没有心肝，如同今日中国的80后90后一般。但如果到了40岁激情仍未沉淀，还看不穿那些梦想之无稽，不从浪漫走向现实，那说明此人一辈子也长不大，智力始终没有发育起来。

如此说来，我在 40 岁前可算没有心肝，而 40 岁后却丢掉了脑袋。

我大概是国人中最先看出所谓“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的先知先觉之一吧。1971 年，在伟大的“批陈整风”运动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全党读几本书，为此批准了姚文元同志的读书计划，其中就有《天演论》。文元同志找了几个教授来，重译出版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我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立即从书店购得该书，彻夜攻读，当下如拨迷雾见青天：原来，自私是一切生物的本能，是它们的生存前提，在人类社会里，自私本能就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可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无视了这一点，把一个伟大的理论体系建在了流沙上。如此逆天行事，当然要受惩罚。大众毫无主动创业可能，当然只会丧失生产积极性，变成耍奸使滑的懒汉，悉数吊在国企的公共奶头上猛吸，用敝乡的俗话来说就是“吃死老公不戴孝”，最终是大家同归于困顿。这种所谓生产关系的变革，完全是蓄意谋杀生产力。

我变成铁杆右派，就从合上那书本之时起，此后一直都坚定不移，直到我出国后，这才“四十而惑”，开始怀疑过去的 conviction 是不是真就那么无懈可击。

虽然北欧搞的是“分配型”而不是“共产型”的社会主义，但只要是社会主义，它就必然是懒汉的乐园，其结果必然是经济毫无生机。然而奇怪的是，这“宇宙真理”似乎在北欧并不见效。前节介绍过，瑞典的工业化从 20 世纪初才开始，二战后出现经济高速增长。这段关键时期中主要由社民党执政，该党 1932 年上台，1976 年下台，统治了整整 44 年。在该党治下，瑞典不但建成了福利国家，而且迎来了高度繁荣的黄金岁月。

只是到了 90 年代初期，该国才因房地产危机而引发严重经济危机，银行破产，失业严重。执政的中右政府采取了类似撒切尔改革的措施，拍卖国企，削减政府支出，经济才开始复苏。但社民党奠定的福利国家的基本框架再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了，瑞典至今仍然是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但这并没有让它失去国际竞争力。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瑞典也受到了连累，但很快就恢复过来。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2011-2012 年，瑞典的竞争力为全球第三名，2012-13 年为第四名，2013-2014 年预期为第六名。

这世界经济论坛是何方神圣？中文维基百科曰：

“世界经济论坛（俗称达沃斯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 WEF）是一个以基金会形式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成立于 1971 年的论坛以每年冬季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举办的年会闻名于世。‘达沃斯论坛’每年聚集最高端全球商界、政界、学术界和媒体领域的领袖人物，讨论世界所面临最紧迫问题。”

既然有全球商界巨子参加，想来不完全是只知哗众取宠、讨好穷人懒人、毫无远见卓识的公知吧，姑妄听之可也。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芬兰的排名也跟瑞典非常相似，2011-2012 年，芬兰的竞争力为全球第四名，2012-13 年为第三名，2013-2014 年预期为第三名。须知芬兰起

步比瑞典更晚，原来一直是个落后农业国家，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才开始工业化，然而此后经济却高速发展，迅速跃升为发达国家，虽然论人均 GDP 不如挪威、丹麦与瑞典（2012 年该三国分别为第 3、7、8 名，而芬兰为第 15 名），却被多家机构评为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而经济奇迹的发生，恰与社民党执政、全国被建为福利国家同步。

所以，北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繁荣的历史与现状，似乎驳斥了“社会主义与可持续的经济繁荣不兼容”的“宇宙真理”，这就不能不动摇我当年坚定不移的信念，使我不可避免地堕入“四十而惑，五十不知天命，六十耳朵越发不顺”的困境。我原来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它缺乏可行性，必然事与愿违，化为共穷主义，并不是否认它的道义感召力。如果社会主义同样能引来繁荣，那又何乐而不为？毕竟，“均富”的生活方式似乎要更健康、更公平、更人道些。

一般来说，我虽然保持自己的头脑向各种可能开放，但不会轻易改变原来经过理性思考确立的信念。我原来的保守主义观念是经过理性思考形成的，因此自然要对北欧社会主义要持怀疑主义态度，想确定它是不是 *an exception that proves rule*，“证明了一般规则的一个例外”。所以，黄天蚩网友质疑本文提出的那些问题，我其实早就考虑过了，原计划就是要在本节讨论。

最显而易见的例外因素就是，除了丹麦外，北欧其他三国都是“大国寡民”。所谓“大”，当然只是按欧洲标准而言，“寡民”则即使按欧洲的标准也成立。四个国家的全部人口加起来还没有重庆市的多（瑞典 950 万，其他三国都是 500 多万，共计 2500 万左右，而重庆将近 3000 万），人均资源占有量大概居世界前列。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未能妨碍北欧发展，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然而却也不然，丹麦根本就没有多少资源，面积 4.3 万公里，人口 5.6 百万，平均每平方公里塞了 130 个人，然而人家去年人均 GDP 为世界第七位，过去三年的全球竞争力分别为第 5、9、8 名。类似地，奥地利 8 百多万人口，领土 8.3 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塞 100 人，去年人均 GDP 第 12 位（美国为第 11 位），过去三年全球竞争力分别为第 17、18、19 位。奥地利的竞争力之所以相对较低，我看主要是该国如英法一般，一度走上国有化的邪路，虽然此后屡经削减，但至今大型工业企业的国家控股比例仍然颇高。

所以，高人均资源占有量未必能解释北欧奇迹。实际上，自 70 年代以来，随着亚洲经济开始发达起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发生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经济转型，就连瑞典也不例外。该国工业最繁荣的时代似乎是 70 年代，但此后便迅速萧条，让位给所谓的第三产业。游客如今到斯德哥尔摩去坐游船，还能看到 70 年代留下来的关闭了或是改造了的工厂的遗迹。在以服务业为 GDP 主要份额的国民经济中，人均资源占有量似乎不再是什么决定性因素。

战争破坏与否似乎也不是什么决定性因素。论破坏之彻底，有哪个国家比得上德国？整个被老美炸回了石器时代。然而德国也是高福利国家，按前文给出的“社会主义”定义，德国就算不是纯社会主义国家，起码社会主义的成分也相当高。可谁敢否认德国经济的活力？

我那天还在回答欧客的跟帖里感慨道，德国完全是只不死鸟，为两德统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光是为重建东德，关闭东德那些污染严重的烂工厂，斥巨资改善生态环境，让

东德人民也享受同等福利，联邦政府就不知道烧掉了多少钱。更何况老美 2008 年搞金融欺诈，把欧洲拖进了“美国资本主义泥坑”，害得英国几乎破产，更使得整个欧元区濒临崩溃。之所以至今摇摇未倒，完全是德国在那儿死扛着，害得德国人民这些年挣的钱都贴进那无底洞里去了（据 BBC 现场采访，自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德国 GDP 仍逐年上升，然而人民生活基本无改善，全贴进欧元区去了）。而德国之所以奋力扛死马，乃是因为科尔当初接受了列强给他开出的统一条件，同意让德国扛欧元。李元霸扛鼎扛到这会儿居然没有脱阳倒地，真是了不起。

这些当然是题外话，就说北欧吧，四个国家的发达程度都差不多，但逃脱战祸的只有瑞典一家。芬兰尤其打得结棍，打的时间最长也最惨烈，为什么在战后还能迅速起飞呢？已经说了，芬兰的工业化是 50 年代才开始的，在发达国家中，有哪个国家的起步比它还晚？

由此可见，逃过战祸似乎也不能用来解释北欧模式的成功（起码是相当时段内的成功吧）。

黄天蚩网友问：“你怎么知道瑞典当初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不会发展得更快？”

这类虚拟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就像“偶然是必然的表现”无从证伪一般。勿过，窃以为，假定瑞典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确实会更快些，那也不能否定其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功，盖它起码做到了在繁荣的前提下的均匀分配。除了不可理喻的极右派，一般人恐怕都会同意贫富悬殊是一种社会病态吧？能够消除这种社会病态，本身就是极大的成功，即使牺牲了一点发展速度，我看也是值得的，何况是否真的牺牲了发展速度只有天晓得。上面已经说了，芬兰的发展速度，恐怕在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难找到第二例。

至于瑞典 90 年代遇到的严重经济危机，以及政府在其后作出的一系列改革，我看似乎也不足以支持黄网“原来的瑞典模式，和苏东社会主义一样，已经破产。因此，自 90 年代起，从社会党到保守党再社会党，一路下来，对原来的模式进行了根本的改变”的严重结论。上文已经说过了，这些改革并没有撼动福利国家的基本框架，瑞典至今仍然是收入最均匀的国家之一，公民并未丧失原来享受的基本福利。而按照上述“社会主义”定义，只要这条没变，就不能说瑞典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何况要判断一个模式是否失败，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段才能看清，否则难免重犯马克思的错误。

上世纪 30 年代世界性大萧条，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在访问美国后接着又访问莫斯科，跟斯大林说，我刚从华盛顿来，发现美国人正在干你们干过的事儿，忙着成立一系列管制全国经济的政府部门，看来资本主义已是穷途末路，所以连美国都不得不向你们学习了。的确，当时所有的左派包括马列主义者都认为，马克思的预言正在实现，资本主义的死穴——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所有制之间的致命矛盾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作，大崩溃即将到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后来历史发展完全反了过来，当时一枝独秀高速增长的苏联经济后来一蹶不振，而几乎陷入灭顶的资本主义世界却迎来了劫后辉煌。

类似的事在 2008 年又发生过，华尔街的金融欺诈引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为避免全国破产，许多国家都不得不使出社会主义的辣手来，靠政府财力将大企业 bail out，甚至对大银行实行国有化。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根据这一事实认定，美国模式的金融资本主义业已

破产，必须靠社会主义救命？

事实上，瑞典乃至整个欧洲在过往遭受的经济困难，原因相当复杂，似不宜归结于某个单一因素。在我看来，有如说那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莫如说是全球化的冲击。瑞典以往的繁荣主要是向第三世界销售工业产品换来的，当亚洲开始腾飞之后，其廉价劳动力与原材料立即使得发达国家的产业失去了竞争力，于是这些国家只好将经济重点转移到服务业上去。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普遍受到这一浪潮冲击，瑞典并不是唯一一家。如果我们可以把瑞典过去的经济危机归咎于社会主义，那对其他国家遭受的类似困难又该怎么解释？

当然，美国右派同志一定会说，那是美国的社会主义倾向闯的祸。但这些非基同志多半是凭激情发言，并无多少理性可言。就连 30 年代大萧条，他们都有本事赖到罗斯福的社会主义新政上去。其实我早在旧作中解释过了，西方的普遍困难是全球化引起的，它使得资本纷纷流向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而这是资本家而不是其他人造的孽。相反，工人阶级历来是反对全球化的先锋。他们凭自私本能意识到，如果工厂都逃到第三世界去，自己马上就失业。

事实上，在北欧发生的悲剧，早就在美国小规模地演出过了。在 50-70 年代，美国的钢铁工人过的也是类似北欧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幸福生活，那福利我看比 北欧还高。可惜后来南韩的钢铁工业就搬起了，美国钢铁企业经不住竞争，纷纷陷入危局，工厂内办的免费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等纷纷关张，最后连整个工厂都倒闭了，全套设备按废钢铁价卖给了中国。这当然在表面证明了哪怕是在微观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道路都走不通，但深层原因却是全球化使得西方工人的高待遇难以为继。

相比之下，在全球化的强劲冲击下，北欧还能在保留了公民的基本福利的同时，显示出高度的国际竞争力，这本身在我看来就是巨大的成功。

这当然不是说，我真的认为社会主义道路确实走得通。我已经在前面说了，我对这问题的认识至今稀里糊涂地没想明白。最主要的问题黄天蚩网友其实没说，而我觉 得才是最关键的，那就是种族问题。我也知道，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极度敏感，但这就是我这次去瑞典最深的感触——我看到了“天堂”上的深深的裂痕。

（抱歉，最近几天又堕入昏睡期，迟迟未写完此文。今日好不容易醒转，赶快接上）

黄天蚩网友有点看得很准，那就是瑞典在 90 年代遇到的危机，与其高失业分不开，但他认为“先发展，后福利”（也就是我党的“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的“宇宙真理”）则未必成立。已经在前文中说过了，北欧尤其是芬兰的高速发展，与其福利国家的建成基本同步，并不是先有高速发展，再建福利国家。

英国的例子更有说服力：胡平同志业已介绍过，英国的全民保健是 1948 年建立起来的。他没说的是，英国史学界对工党首相艾德礼的评价很高，认为他富于远见 卓识与非凡勇气。英国在战后失去老美的战时输血，濒于破产。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国家根本没有相应财力，要搞福利也得等熬过艰难岁月再说。但他还是力排众议，毅然启动了社会主义改造，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福利政策，全民免费医疗不过是最得民心的一个。虽然实行国

有化是一大错误决策，但当时英国也并未因此堕入困顿。

实际上，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国家）的建成与维持的唯一前提，是全民就业。只要这个条件满足了，则全民福利就能建立起来并维持下去，盖福利来自于全民税收，只要社会处在充分就业（即伪经济学家所谓“完全就业”）状态，全民福利自然也就处在自给自足状态中。但若社会上出现了一部分失业人员，则全民福利必然遭受“双斧伐木”（非古典色情小说指的“斧”与“木”），造成入不敷出——一方面，税收的来源缩小了；另一方面，失业救济金的发放使得福利支出剧增。若还要维持原有福利，那就只能不是增加税收，就是借债经营。加税总是有限的，于是政府便债台高筑，直到再也撑不下去，由右派上台，削减福利，降低税收以刺激经济，使得国家的预算稍微恢复平衡。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欧洲（除东欧外）社会主义是怎么实现的，那完全是二次大战的“破窗效应”。二战使得欧洲除少数国家外成了瓦砾场，战后重建的巨大工程自然要造成全民充分就业，所以哪怕濒临破产的英国，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建立自给自足的福利。而相对于西欧与南欧，瑞典人的聪明在于，他们虽然也搞了点国有化，但其规模没有英、法、意大利、奥地利那么大，主要靠的还是私有经济，而唯有私有经济才能保持经济活力，提升就业。换言之，他们搞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儿的“社会主义”前头已经反复强调过了，就是（也只能是）社会福利，而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指导的经济。

明白了“就业”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则不难立即看出中国为何从未建成过一天社会主义——哪怕在毛时代，城市居民也从未享受过类似前苏联城市居民的福利，遑论过上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公民们的幸福生活（请参看格茨·阿利著《希特勒的人民国家》，我虽不懂德文，仍能猜出原书名 *Hitlers Volksstaat* 相当于英文的 *Hitler's People's State*。可惜国内译者出于政治考虑，曲译为《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实际上，任何一个粗知德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希特勒建立的确实是不折不扣的人民国家，是德国第一个废除封建等级残留、在人民中实现了政治平等与高福利、因而深得人民拥护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是因为毛共实行斯大林式“高积累、高投资”的血腥工业化战略，但也是因为中国的农业人口基本是“隐性失业大军”的同义语。毛泽东就深知这一点，所以才实行史无前例的户口制，并把农村当成了任意倾倒城市失业人口的垃圾场。

明乎此，则也不难立即看出为何欧洲社会主义难以为继。哪怕是在战后重建工程完成之后，只要欧洲继续负责向第三世界提供工业品，达到充分就业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英国在 60、70 年代陷入困顿并不是高福利的错，而是恶霸工会劫持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鼠目寸光，不顾大局糜烂，动辄罢工，几乎造成经济瘫痪使然。那是该国的特殊问题，并不具有代表性。

但 90 年代之后欧洲社会主义一蹶不振，就完全是全球化造成的普遍问题了。上文指出，今日欧洲无非是在重演美国钢铁企业当年的悲剧：工厂转移到亚洲去，对本国最直接、最致命的打击就是大面积失业，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必须举债救济失业人口。对北欧国家来说，这打击更为致命——北欧三国都是“寡民”，这就意味着该国的经济少了一个火车头——内需，对出口的依赖性更大。

相较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瑞典还有一个特殊隐患——移民问题。我在前文说过，我最喜

欢瑞典的，是该国人民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多年来，瑞典一直是接纳外国难民最慷慨的国家。根据瑞典统计局（Statistics Sweden）提供的数据，2012 年，瑞典接纳了 43,900 名来自叙利亚、阿富汗、索马里等国的难民，比前年增加了 50%，使得瑞典已经变成叙利亚难民在欧洲的主要庇护所。这一趋势至今有增无减。如今瑞典的 9 百多万人口中，15% 的居民是第一代移民，5% 的居民是他们的后代。这还没有把非法移民计算进去，而非法移民已给治安带来了严重问题。今年年初，警察局为寻找非法移民，曾在街上随机拦住外国人模样的人，要他们出示证件，这一举措却引起了本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认为这完全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

然而“升米恩，斗米仇”，好心未必有好报。今年 5 月 13 日，警方射杀了一名嫌疑人。死者是葡萄牙移民，却被误传为“非白人”。消息传开后 6 天，斯德哥尔摩发生种族暴乱，来自索马里、厄立特里亚、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数百名青年暴徒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放火焚烧车辆和建筑物，以石头袭击警察、医护人员、救火人员。暴乱发生后，警方采取奇怪的“不干涉”态度（这是警方发言人说的），致使暴乱持续了一周多，并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其他地区去。直到当地居民忍无可忍，自发组织了队伍上街弹压，才用“人民战争”把暴乱镇压下去。







这种事，发生在洛杉矶不足奇，发生在伦敦、巴黎也不足奇，但发生在那“天堂”中，对我来说就是晴天霹雳了。更令人深思的，是“社会主义”与“移民”是否兼容的问题。

事发后，瑞典的左右两派都有说词。左派说，这是中右政府上台后削减福利、降低税收导致急剧贫富分化的恶果。如今瑞典已经成了 OECD 国家中不平等度增长最快的国家，因此制造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次暴乱就是对这一政策的惩罚。而极右派则归咎于瑞典的移民政策。

有的论者则认为，移民问题凸显了某些政策的不合理性。为了保护工人既得利益，瑞典劳工法规定的最低工资太高，等于人为提高了就业门槛。而且，企业裁员时必须先裁去最新雇佣的人，实际上对有一定年资的员工实行了终身雇佣。这结果就是新移民由于语言障碍和/或缺乏技能而无法找到工作。所以，尽管全国平均失业率为 8%，但在瑞典土著中只为 6%，在移民中却高达 16%，在 25 岁以下的移民中更高达 32% 以上。

这结果就是令新移民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成了边缘族群。尽管衣食无忧，免费住在政府在六七十年代实行“安居工程”建造起来的相当不错的公寓楼中，他们仍然愤愤不平，觉得受到了种族歧视。有位被采访的来自阿富汗的暴徒说，瑞典确实给了他在本国无法设想的待遇，但他仍然感受到无时无地不在的种族歧视。

在我这局外人看来，这分析相当客观公允。令人沮丧的是，这种被动或主动的边缘化的趋势似乎无从逆转。尽管教育是免费的，有许多新移民的青少年并不去上学，而是呆在本族人聚居的社区中看本国语电视，顽固地保持“文化近亲繁殖”。这结果便是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稍具技能的工作，遑论整合入移居国文化中。政府为鼓励生育发放的儿童津贴又变成了失业父母的生活手段。他们的孩子自然只会遵循父母的道路，靠救济过完一生，并生出更多的孩子来。这远期结果就是，哪怕瑞典现在停止接纳移民，失业人口也只会越来越多，而社会主义也终将垮台。

必须指出，这并不是瑞典面临的特殊问题。如 Light 网友说的那样，在美国，有的人什么也

不用做，光生孩子领津贴就是了，他的一位房客竟然生了 9 个孩子。相比之下，中产阶级为了确保生活质量，或是累到丧失了性欲，自然要在这场“生育竞争”中败下阵来。看来，这才是社会主义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移民造成的最大问题，还是它有沦入恶性互动的可能。种族主义在瑞典历来没有什么市场。尽管纳粹把北欧人捧成“主子种族”，瑞典人也并未被冲昏头脑。即使是 在纳粹席卷全欧之时，国家社会主义（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种族社会主义”）在瑞典也没有什么市场，与挪威完全是两回事（即使在挪威，吉斯林的党当年也从未 进入国会，他本人是纳粹扶植起来的傀儡，但瑞典就连那种全国性的组织都没有）。

然而近年来这传统却有被打破的危险。极右的民主党过去从未在大选中获得国会议席，却在 2010 年瑞典议会大选得票 5.7%，首次进入国会，取得 20 个议 席。在这次骚乱后，许多瑞典人被“种族歧视”的指控激怒了，反而转为认同该党的反移民主张。如果种族问题持续下去，瑞典发生“挪威化”，极右的瑞典民主党 变成挪威极右的进步党那种有问鼎实力的大党完全是可以想象的。这种阴暗前景，不能让我这个新移民脊梁发凉，英文所谓 *send chills down the spine* 是也。

我就是带着这种复杂心绪再访瑞典的，而我的所见所闻，似乎也加深了杞忧。斯德哥尔摩的 TOP 10 景点之首，就是古城 *Gamla Stan*，据说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此类狭街窄巷的小城镇，在欧洲其他地方毫不罕见，别说在意大利，在英国也是车载斗量，但在瑞典那个比较新的国家就 罕见了。何况那地方就在皇宫旁边，所以不能不去：



那天我和太太从皇宫出来，刚刚走进那小街，就看见四五个闲汉在搞局诈。那戏法很简单，用三个火柴盒盖住一个球，然后把那三个盒子的排列搞乱（如同扑克牌洗牌一般），让你说出小球在哪个盒子下面，五百瑞典克朗猜一次（大约相当于人民币 500 元，我忘记问赢

了给多少钱了)。在“洗牌”时，那庄家有意露出了火柴盒下面的球，然后又迅疾盖上，因此你很容易便记住了球在哪个盒子下面。可猜的那个人偏偏却指错了。我于是忍耐不住，叫道：不是那个，是这个！是这个！

那家伙立即要我掏钱下场，说只要我给他 500 克朗，他就翻出盒子来让我看看猜对了没有。我这人其实毫无赌性，只是好胜心强，见到那球明明在那个盒子里，旁边那人却傻到去指另一盒子，于是便好为人师一把，不料立即被那庄家赖上。我只好说，我没那么多钱，只有 100 克朗，行不行？那人说不行。我于是想掏钱，却被太太拉走了。她埋怨我道：你怎么那么傻？那些人都是托儿！我说，我知道，so what? 我明明看见球在那个盒子下！但大家都知道，跟娘们是无法讲理的，所以我只好跟着她悻悻地去街尾的“宝岛饭店”吃晚饭去了（不是台湾口味，是大陆人开的）。

过后我立即就悟出来，那个故意指错盒子的就是托儿，目的是诱骗我这类自以为是的家伙上当。那小球可能确实就在我认定的盒子下面，但那又怎么样？那里面可能有个擒纵器，捏住了某个地方，盒子内的夹子就把小球夹住，拿起来一看，地上自然什么也没有。到时周围的闲汉托儿们一起哄，我除了认输还有什么办法？

虽然这局诈骗的钱并不多，但这事却让我无比地恶心。TMD 就在皇宫旁边，在斯德哥尔摩的 TOP 10 的 No 1 公开行骗，成何体统？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一家麦当劳解决午餐，排队买饭照例是我的事。我穿着件夹克，现金和护照都放在衣服衬里的包里，信用卡则放在外面的包里，因为我用的是中国产的信用卡盒，表面比较光滑，容易掉出口袋来，我便把那包的拉锁拉上了。

我正在排队，却觉得有人在拉我左边口袋的拉锁，掉头一看，是个年青小伙，他站在我左侧，右手捏着一张 50 克朗的钞票抬向柜台，做出要把钱递给售货员的样子，右臂上搭着一件衣服，左手则借用那衣服的掩护，试图拉开我左侧衣袋的拉锁。

我十分恶心，但还是给那个小偷留了个面子，只是把他的左手打开了，什么也没说。我想，这已经告诉他我察觉了他的小动作，他应该知难而退了。可惜过了一会，我又觉得左边有只手在蠢蠢蠕动，我掉头一看，他迟钝到懵然无觉，还在埋头继续那开袋工程。我大怒，用劲把他的手打开，厉声叱道：Stop it! You really made me sick! How pathetic! You are not even a competent thief! 他这才算悻悻地收手。我忍了又忍，才没从内胸包里掏出钱来给他看，告诉他找错庙门了，即使打开我的左侧衣袋，偷走了我的信用卡，他也拿不到一分钱，盖欧洲的信用卡不像美国的那样，都有 PIN，不知道那密码什么用都没有。

比起意大利来，这不过是迷你菜一碟了。在罗马地铁上，我被一位偷儿洗刷得一干二净，就连手机都给偷走了，只留下了护照和信用卡，那才是真正的 professional，不是这种 amateur。在米兰大教堂广场上，我遭到几个壮汉抢劫，全靠我大声怒骂，而且那又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匪徒们才知难而退。



米兰大教堂

可这是北欧，不是南欧啊！而且，这是瑞典，是我二十年前心目中的天堂！

最后一晚最扫兴，夜里两点半，旅馆过道上突然人声喧哗，一群“挺能杰儿”在外面大叫大喊，使劲摔门，甚至还使劲敲我们的门。我从熟睡中惊醒，躺在床上大叫“quiet!”外面的hooligans却毫不理睬。我打电话给大堂抗议，却没有人接。因为不知道外面究竟是些什么人，最明智的选择就只能是龟缩在屋里。直到警察来了，把那些人带走才复归太平。次日我结账时，向旅馆工作人员提出抗议，对方立即道歉，并表示愿意归还我头晚的住宿费。我不好意思要，只是问她那到底是些什么人，她却拒绝回答，只是让我放心，说那伙人再也不会来了。可我这辈子怎么还会再去？

这种事，就是在社会治安最差的南欧也遇不到，更是我 20 年前在瑞典居留时做梦也想不到的。我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移民，虽则在 Gamla Stan 设局的那伙烂人看上去不像北欧人，但我并无任何根据作出判断。我可以说的，就是“天堂”成了“失乐园”，这就是当飞机腾空而起，我看着脚下无边的森林与湖泊时心里挥之不去的惆怅。

结语：

- 1) 可以建成而且能真正令平民百姓受益的社会主义，就是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欧美发达国家其实都含有社会主义成分，只是多少不同而已。如今唯一不含社会主义成分的发达或准发达国家只有中国一家。
- 2) 伯恩斯坦说的是对的，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民主实现。而且，只要是民主国家，最终的发展趋势都必然是社会主义化，这是因为民主国家的分配权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 3) 欧洲社会主义承受的打击，是资本的全球化动摇了“全民就业”这个前提。但这打击并不限于社会主义成分较高的发达国家，而是整个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美国也不能幸免。反对社会主义的同志们应该看明白，欧洲陷进去的“泥坑”并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资本全球化掏空了发达国家产能带来的灾难。即使美国取消一切社会福

利，倒退到 19 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也并不能躲过这场浩劫。

列宁同志在上世纪初提出“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理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他的基本考虑是，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 垮台，是因为帝国主义靠掠夺第三世界维持了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高工资，所以，必须在第三世界发动革命，断了西方工人阶级的粮道，才能让他们起来造反，推翻 资本主义。百年后回看历史，不能不惊叹列宁同志的洞察力。只是他有一点估计错了：搞垮西方世界的，不是第三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而是西方的资本家。而且，他 们搞垮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反而是真正可行并真正造福于平民的社会主义。